

探索异彩纷呈的军事世界

饱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军事知识大博览



第三册

【图文珍藏版】

王佳乐◎主编

线装书局



世界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军事知识大博览

军事知识大博览

王佳乐◎主编

第三册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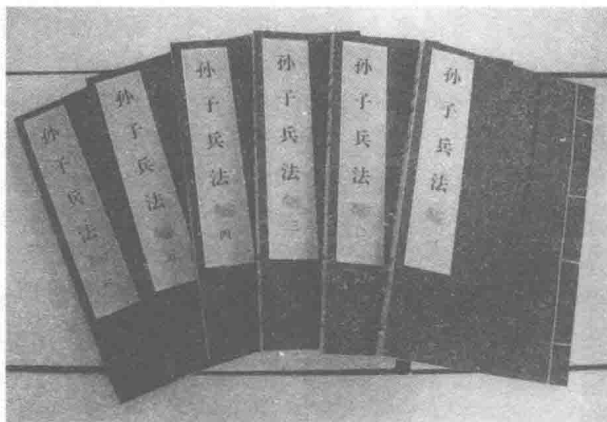
线装书局

第十二章 间谍诡影

一、间谍史话

(一) 间谍萌芽期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见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很早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知”与“战”的内在联系和实施次序。即“知”与“战”二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先“知彼知己”，然后方能“百战不殆”。正如春秋军事家管仲所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而其显然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说战争是间谍的温床，而间谍则是战争的产儿。因此，要探间谍活动的起源年代和产生原因，就必须先追溯战争的源头。



《孙子兵法》书影

战争，在甲骨文中称为“争”或“伐”，也称为“战”、“兵”、“戎”、“征”等，“战争”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一书。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战争为“原始社会末期战争”（距今约五千年）。如“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尧攻驩兜丹水之战”和“舜、禹对三苗之战”等。在“舜、禹对三苗之战”中，禹就是根据“三苗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情报而兴兵讨伐的。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时，“执玉帛者万国”，荀子也说：“古有万国。”又因为当时存在“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多变局面，使得“以石为兵”的参战或观战各方，都极力想探察敌方的虚实和窥视邻族的意图，从而避免盲目行动。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的特定需求下，“知彼知己”的这一永恒真理，便在战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萌芽产生了。而“知彼”的这一任务又势必要由专人承担执行，这样的人，就是间谍。

因此,古代中国的间谍活动应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的间谍活动的产生年代当居其之首,并且有文字记载的间谍人物也是世界间谍之始祖。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间谍活动见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又认为《圣经》中所提到的娣莱拉是“地球上第一个女间谍——情报鼻祖”,孰是孰非?还是以史实来回答吧。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斯巴达王兄阿伽门农率领大军远征围攻特洛伊九年不下,后采用“智囊”奥德修斯之计,将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装退兵。特伊洛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夜间,伏兵从木马中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军乘机涌入,摧毁了特洛伊城。

根据这一传说和后世学者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考证,“特洛伊木马”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12世纪,而中国春秋古书《左传》明文记载了“少康使女艾谍浇”一事,却在约公元前20世纪,早于“特洛伊木马”之事达800年之久。

《圣经》中记载约于公元前10世纪时,在地中海东岸的费利士部落里有一名少女叫娣莱拉,她在希伯莱人与费利士人的一场血战中,被希伯莱士兵俘虏,惨遭蹂躏,后被一牧羊老妪救出。费利士酋长为了谋杀希伯莱勇士参孙,便派娣莱拉对参孙进行色情间谍活动。参孙果然中计,并于酣睡中被剪去聊以维持体力的七络头发,只得束手就擒。费利士酋长下令用参孙的头去祭祀夏收节。参孙在被押进神殿时,怒视了娣莱拉一眼,便一头撞塌了神殿,与娣莱拉同归于尽。事后,希伯莱人厚葬了参孙,也出人意料地厚葬了娣莱拉,并在她的墓碑上刻道:“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这样做的女人。”

在中国战略《吕氏春秋》一书中则记载了早于娣莱拉600年前,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的一件女间谍案例。商汤派伊尹为间谍,多次打入夏朝内部,并收买了夏桀的宠妃妹喜,妹喜向伊尹提供了夏桀军事部署的绝密战略情报,从而使商汤制定了正确的作战计划,终于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而且也首开世界间谍史之先河,成为世界间谍史的源头。

由于年代久远,夏、商两代的间谍活动文献记载稀少,仅见“女艾谍浇”;“伊尹间夏”;“妹喜泄密”;“吕牙间商”;“崇侯虎侦监姬昌”;“姬发使间探朝歌”;“祖伊暗察国人”等几例,其中“伊尹间夏”和“吕牙间商”二例,被《孙子兵法·用间篇》引用。

纵观这一萌芽时期的各类间谍活动,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间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军事领域。从被称为“间谍始祖”的女艾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来看,其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的。这时期的间谍理论尚未形成。虽然相传论及用间的古兵书《六韬》是吕牙所著,但经历代学者从内容及文字结构上考证,断定为战国时人伪托,非殷商时之作。此外还值得指出:夏商二代的间谍活动不仅具有战术性,而且更具有战略性。“伊尹间夏”的案例便能说明这一点。

二是这一系列间谍活动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派遣、指挥。少康与女艾;商汤与伊尹;周文王与吕牙;商纣与崇侯虎等,都是君与臣的关系,也都是在最高层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为后世春秋的孙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用间史料,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理论



基础。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时的用间，实际上成了君遣臣行的状况，其层次规格之高，令人惊叹。由于少康首开以臣子女艾为间之端，后世历代君主均步其后尘，视间谍活动为制胜之宝，而且还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对抗性领域中都广泛地开展间谍情报活动。

（二）间谍发展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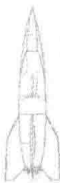
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而亡。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他表面上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暗地里却派自己的兄弟三人，留在殷地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史称“三监”。这一政治性的内部监控事件，打破了以往间谍活动仅用于军事和针对敌方的局限，扩大了间谍活动的领域，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金文史料看：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也照例设置像“三监”一样的“诸监”。如《仲纪幾簋》记载道：“仲幾父使幾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诸监”是中国最古设置的间谍专职官员。

至周王朝第十代国君周厉王时，政治性监控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因此招致“国人谤王”。周厉王盛怒之下，便派遣了卫国的巫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当然，周厉王并非凭借一个巫士或所谓有“神灵”就能“弭谤”，他主要采用的就是派遣间谍对国内臣民进行政治性间谍侦察和控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又记载道：“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说明周厉王后期对臣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监控，竟然使得人们在对面相遇时，也不敢以言论王，惟恐被周厉王的间谍听见，只得互相使个眼色，以表示内心愤懑罢了，可见其监控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大。究其后世历朝历代的特务恐怖统治之由，莫不出于周厉王的这一“创举”。

反映周朝职官制的《周礼》一书，在《秋官》一章中记载道：“掌士之八成，一曰邦诇……三曰邦谍。”历代注家都认为“邦诇”和“邦谍”说的就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秋官》中所说的官职，是掌管“邦禁”的“刑官”，可见周代时已出现归属于“刑官”的严密而系统的间谍职官。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间，共发生了 614 次战争，其中春秋为 384 次，战国为 230 次。又据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序》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下，其战争的特点也是多方位的。即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宣传斗争等紧密交织在一起，间谍活动的领域因此也大为拓展，并逐渐具有全局战略性，间谍的任务也由单一性扩大到集多任于一身。

各政治、军事统治者在这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以强凌弱的复杂激烈战争中，难以准确及时地驾驭风云多变、气象无常的战争进程，于是就特别借重和依赖于间谍，因为不“知彼”，就无法去“乱彼”，更谈不上去“破彼”。只有先“知彼”，才能因势制宜、随机应变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战争产生了间谍，战争的发展也随之发展了间谍活动。间谍犹如战争的一个“身影”，随着战争的种种变化而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间谍活动的全方位展开和飞跃进展,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两个深奥的道理,即:一是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外交、经济、宣传诸领域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并非是打赢战争的惟一手段和最好办法,如果先掌握和了解敌方或他方的虚实,实际上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己方的实力和削弱了敌方或他方的实力,甚至可以“兵不血刃”而战胜对方。这两点认识在春秋末期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其理论化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如宋代欧阳修所说的“攻人以谋不量力,用兵斗智不斗力”的高层次战争阶段。因此间谍的地位也日显其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所以可以称春秋战国为“间谍黄金时代”。

春秋间谍史的头等大事,当属《孙子兵法》的问世。它的问世是古代中国间谍活动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部兵书,而其中的“用间篇”也是世界最早的用间专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孙武在“用间篇”中科学、缜密、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用间之利害关系、类别、作用、原则、纪律、任务、谋略、招募和范例,形成了完整的间谍系统理论,在当时及对后代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用间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是谍报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为不朽的间谍理论。

《孙子兵法》实际上是对春秋前的各类战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一部兵书,其中的“用间篇”也是在对以往间谍案例的归纳概括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精粹。反过来,也可以从“用间篇”中找到夏、商、周间谍案例及用间思想的明显痕迹。譬如:“用间篇”中所说的“五间”,都能在三代间谍史中得到印证:

因间——城濮之战中,晋将先轸利用楚人掌握了解了楚军的情报,从而大获全胜;楚宋之战中,宋将华元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由乡间引路,竟乘夜进入楚营摸到了楚将子反的床上,胁迫楚军议和。

内间——越王勾践以吴国太宰伯嚭为内间,窃情报、乱吴国、杀忠臣,最终灭吴称霸;田氏家族派田豹打人权臣阏止家族充当家臣,探知阏止准备袭击田氏家族的机密,从而使得田氏家族先发制人,除掉了阏止。

反间——鄢陵之战中,晋将苗贲皇巧用楚军俘虏为反间,不战而胜楚军;平阴之战中,晋将范宣子以齐大夫析文子为友间,透露假情报,又制造了假部队,一举吓跑了强大的齐军。

死间——郑武公在袭击胡国前,以其女为死间,迷惑了胡君,乘其不备灭了胡国;吴王阖庐先后派专诸、要离为死间,成功地暗杀了政敌吴王僚及其子庆忌。

生间——史书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多次往返于双方;韩原之战中,晋惠公派出大夫韩简为间,韩简侦察到秦军军事秘密后,又独自返回报告。

春秋的间谍活动,除了在军事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外,也扩展到了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元前686年,齐国的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和齐襄公的后妃,暗中联合监控齐襄公。当齐襄公后妃密告其在野外狩猎的行踪时,公孙无知等人便袭杀了齐襄公,发动了一场宫廷夺权的政变。

像专诸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等行动性暗杀间谍活动,都属于政治间谍事件。

公元前629年,晋秦联军围攻郑国,郑文公于危难之际,采纳大夫佚之狐之计,派烛



之武为间,夜缒城下,去秦营秘密游说秦穆公。烛之武用晓之以利害的娴熟外交辞令,终于说动了秦穆公弃城而去,从而离间破坏了晋秦联军,保全了郑国。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去世之际,兴兵伐楚。他又派季札出使晋国,以窥视中原各国对吴攻楚的反映,季札成功地刺探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只因吴王僚被暗杀而束之高阁。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受孔子委派,为了保全鲁国的安全,出使齐、吴、晋、越四国。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连连得手,竟使四国的统治者对他言听计从,互相残杀。司马迁评论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堪称间谍外交大师。

秦秋时的间谍专职官员主要设置在军队中,其中以晋国最为突出。晋军专设“候正”或“候奄”一职,与军尉、舆尉、司空、司马同属一级官阶,具有较高的地位。正因为间谍情报对于国家、军队的存亡胜败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招募选择间谍上,多以“上智者”为间。然而,由于其进行的是“事莫密于间”的绝密活动,所以一旦败露泄漏,也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这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最早见于史书的惩处间谍的记载。《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说:“楚太子建与晋人谋袭郑……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郑人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周礼·秋官·掌戮》也说:“掌戮,掌断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谍谓奸寇反间者,谍与贼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孙子兵法·用间篇》则说得更明白:“间事未发而先闻乾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在间谍的使用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纪律制度,表明当时的间谍活动正趋于成熟。

战国间谍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合纵连横的间谍活动为中心。尤其是秦国,已经把连横间谍活动做为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如果说春秋时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么战国时则是“国之大事,在间在戎”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已指出:“秦国阴遣谍士赍持金玉,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肯者,利剑刺之。”采用收买贿赂与暗杀行刺等软硬兼施的间谍手段,先是分化瓦解,扰乱破坏敌国内部,然后再配合以凶猛的军事行动,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间谍代表人物有:魏国的公孙衍;秦国的张仪和范雎、顿弱和姚贾;燕国的苏秦和苏代兄弟等。他们的间谍活动常常带有战略性质,对于国家存亡、军队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和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间谍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中又以秦国的历代君王为其魁首。从春秋秦穆公策反西戎由余始,秦孝公、秦昭王、秦始皇等国君都极其重视用间。尤其是秦始皇可以说是战国高层用间的集大成者,像派间谍“行金万斤于魏”收买晋鄙门客为间,谗毁并借魏王之手罢免了秦国宿敌信陵君;“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致使赵国名将李牧被杀;遣顿弱携万金,“东游韩魏”,“北游燕赵”,大破合纵阵营;又于燕赵齐楚“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之际,命姚贾约车百乘,载金千斤,出游四国,离间各方,以绝其谋,以罢其兵等,都是秦始皇的用间杰作。

战国其他领域的间谍活动也相当活跃。譬如张孟谈以外交手段策反韩魏联军;田单以宣传手段迷惑骑劫;赵奢以反间手段欺骗秦军;郑国以经济手段企图削弱秦国;燕太子丹以暗杀手段行刺秦王等,都比春秋的间谍活动范围大为扩展。

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还有两个突出点:这就是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和间谍技术的

更新。

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旧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却由于缺乏人才而步履艰难。于是招揽人才便成了当务之急。像“燕昭王设黄金台”;齐国临淄稷下设学宫等,都是为此目的。而当时最为活跃的阶层就是“士”。于是一度形成“礼贤下士”的风气,各国有权势者竞相“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稍后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其门下都有几千“士”之多,所以“士”也称为“客”、“食客”和“门下客”。这些食客皆身怀绝技,学属多门,即使只有“鸡鸣狗盗”一技之长的也被搜罗其内。他们为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事务,著书立说,无所不为。究其核心是为其主出谋划策,四处行间,所以《六韬》中称间谍为“游士”。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私人间谍集团。这一私人间谍集团的能量极大,以致于影响并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存亡胜负。譬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明白无疑地指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信陵君)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信陵君不但利用“士”在国外编织了巨大而缜密的间谍网,即使在国内,也四处暗插间谍,窃取上至王宫下自百姓的各类情报。

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间谍活动正逐步走向组织化和规范化。为后世国家间谍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当然,私人间谍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借助于“士”的智力、人力来巩固和加强权贵们自身的利益和提高美化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不过也有些例外,从史书看,信陵君的私人间谍集团更多地是用以维护国家利益。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评论的那样:“三公(指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

战国之前,间谍技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由于“重智轻术”的世风而较为原始。情报的传递主要靠“生间”的口头或竹简这类语言文字方式进行传达。简单或报警的情报则用烽燧及驿传来传达。但是一旦“生间”被俘、叛变或烽燧台、驿传被敌所获,则情报往往泄露无遗。于是战国时便发明了一种保密通信法——阴符和阴书。最早见于这二者的文献为《六韬·龙韬》,其中用两个专章“阴符”、“阴书”来分别叙述。“阴符”是采用了3寸至1尺长八种规格,不著一字的竹木符来表达八种情报;“阴书”是把一份情报一拆为三,分头送出,待三人都到达目的地时再三拼为一;从而现出原文,以此来传递秘密情报。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反间谍、反泄密。这在二千多年前是一种相当先进的情报保密通信法。

战国秦将樗里疾又发明了窃听术;《墨子》中记载了当时已经有了窃听器——听瓮。它们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窃听术和窃听器。战国后期荆轲在暗刺秦始皇时,则运用了短刃匕首涂毒药的暗杀技术,使古代间谍暗杀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间谍活动的需求促使各类间谍技术的发明,而间谍技术的产生又反过来促进了间谍活动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15年后便灭亡了。在这短短的十五年中,间谍活动却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反间谍(即今称之为双重间谍或逆用间谍)活动上。

用间与反间,犹如一对孪生子,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一起“降世”。二者互为对立,又相互依存,真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楚汉相争时,刘邦的重要谋臣陈平是一名反间行家。他利用项羽使者对其谋士范增进行反间,翦除了项羽的得力臂膀;匈奴以刘邦使

者反间汉军,以至于刘邦被围困白登山上,几乎做了俘虏,这是第一次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反间活动。秦代的反间活动均属高层的战略行动,对政治局面和军事格局的变化都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譬如陈平策反项羽大司马周殷和以美人图离间匈奴;韩信背水之战前的间谍侦探和以郦食其为死间;郦食其暗杀陈留令和刺探魏王豹军事情报等间谍活动,都加速了刘邦称帝和项羽自刎乌江的战争进程,而且也都各具特色,为后世所仿效。

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匈奴等部落频频侵扰边疆,所以间谍活动又延伸到了西域边远地区,以确保边区平定和国家安全。譬如西汉“马邑间谍事件”;张骞为“断匈奴右臂”两次出使西域;唐蒙以商人为公开搜集夜郎国情报的对象;东汉班超以龟兹国俘虏为反间;段颖反间袭鲜卑;刘秀以塞外羌族人为间等,都是中原对边远地区激烈、频繁的间谍与反间谍战。

汉代的间谍活动较之前代在范围上有所扩大,即从基本上用于军事斗争的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斗争领域。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派其女刘陵到长安为间;赵广汉遣间充任门卒监视丞相府。东汉时,梁冀使间盯梢同胞兄弟;汉桓帝凭间发动宫廷政变;窦皇后命侍者监控宋贵人等间谍活动,对汉代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与动荡,使明争暗斗的政治对抗又蒙上了一层更神秘的面纱,也使其斗争更激烈化、秘密化和戏剧化。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东周与三国是两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战争与间谍的大发展时期。而三国在其短短的四十五年中,就发生战争71次,并且都为大规模的水陆之战。其作战方式、指挥艺术、军事思想与间谍活动都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间谍活动,较之以往更转奇、更转妙、更转秘和更转险。周鲂“间书”诱曹休、司马懿反间破孔明是奇例;白衣渡江擒关羽、曹操谈笑设间计间韩遂是其妙例;张松暗潜作内应、隐蕃受命奔东吴是其秘例;王允收买吕布暗杀董卓、黄盖诈降破曹军是其险例。

曹操在当时可谓是一代用间大师。他认为:“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并亲自注释了《孙子兵法》,首开《孙子兵法》注释之先河。后人称其为:“魏武之神机猛绝,犹依孙吴。”其手下的蒋济、董昭、司马懿、程昱、贾诩、国渊、隐蕃等人都是用间的行家里手,在三国中用间最繁最精。其次是东吴,如周瑜、黄盖、吕蒙、孙韶、顾雍、周鲂等人,也多精于用间。相比之下,蜀汉在间谍活动方面最为薄弱,仅见张松、法正等几例。三国最终的结局是魏国先灭蜀汉,后灭东吴,这恐怕也与间谍情报活动不无关系吧?

魏国霸府的“校事”和吴国的“中书”,清代史学家俞正燮认为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专职间谍机构。魏国反间谍专家国渊以语言分析、笔迹鉴定等方法,侦破匿名信一事,又是世界间谍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反间谍技术,对于后世乃至当今都具有巨大影响和借鉴意义。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朝。由于以司马氏为首的门阀统治集团竟为奢侈,强取豪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各地起义军也蜂拥而起,战事频频。因此,各类间谍活动也随之而日趋活跃。公元303年,起义军领袖李雄以朴泰为间谍,并采用苦肉计,大破官军,这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用间战胜官军的最早记载。

东晋名将祖逖与羯族作战时,对违心依附于羯族的汉人,采取“皆听两属”的策略,实际上是运用了“双重间谍”的手法。为了保护一些暗中为晋朝搜集情报的间谍,祖逖又常率兵去假装包抄抢掠这些人,以表示与这些人为敌,从而免遭羯族的怀疑。所以只要羯

族“有异谋，(祖逖)辄密以闻”。

羯族将领石勒也极善于用间，其手段也颇为老辣娴熟。他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连环间谍活动，先后灭掉了劲敌王浚和刘琨，为称霸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间谍活动起到了决定百万大军胜负的关键作用。前秦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为间，去策反东晋大将谢石，他万万没有料到朱序“身在曹营心在汉”，竟充当了晋军的间谍，从而导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惨重失败。这是一起用间人而反被人间的典型间谍与反间谍案例。

南北朝时的用间特点是模仿笔迹、仿造书信。刘宋名将毛德祖以此反间谍手段间杀了北魏将领公孙袁。北周大将韦孝宽又继承发展其手法，制造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先后除掉了东魏间谍头目牛道恒和北齐名将斛律光。

仅存 37 年的隋朝，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谍影憧憧。像隋炀帝杨广就是凭借间谍情报，使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并取而代之。最值得一提的是裴矩，他是一位被当今史学界称为“完全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情报顾问尼古拉誉为最杰出的情报天才雅各布媲美”的卓越间谍活动家。自春秋时，牛贩弦高假命犒秦军始，商人参与间谍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至隋代裴矩则大大发展了这一领域的间谍活动，他利用各方商人以公开合法手段搜集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裴矩还创造性地使文字情报与军用地图溶于一体，将间谍情报推进至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阶段。

盛唐三百年，并非刀枪入库，偃旗息鼓。据统计，在此期间共发生 192 次战争，尤其对突厥、吐蕃、回纥、平定叛军、“安史之乱”等战争，均为大规模的激烈战斗，间谍活动也在各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在政治斗争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武则天监控元老派；杨国忠刺探安禄山；安禄山反间唐玄宗；史思明窃听杀唐将；李辅国监控皇后；崔胤暗察唐昭宗；李譔伪造诏书反叛等事件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以间谍活动为行动之先导。

在军事斗争方面，安兴贵自荐诱李轨；李世民冒除间突厥；突厥蒙骗李渊杀猛将；李愬反间袭蔡州；黄巢用间破唐军等事件，都充分利用间谍情报，大力发挥间谍作用，因而取得了无法用武力获胜的巨大胜利。

在唐代间谍史中，有两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政治间谍组织的出现和间谍理论的新突破。

唐肃宗时的中书令李辅国私下成立的“察事厅子”是对廷臣官吏进行监视、侦探的政治特务组织，在当时和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藩镇势力，为了窥探观察中央政府的动向，在长安设立了许多间谍情报组织“进奏院”，它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

唐代名将李靖的《李靖兵法》；隐者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赵蕤的《长短经》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的《孙子》注本等，都对用间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是李靖“问所以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的辩证用间思想，成为继《孙子兵法》后的第二个间谍理论高峰。

宋代是古代中国间谍发展史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所以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间谍活动具有战略性。譬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出战略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南宋间谍获取金兵修造兵船、训练水师的情报，断定

他们将从海路侵袭其腹地江浙一带；金人派秦桧为内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宋王朝；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等。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朝野内外，前线后方，都十分重视用间，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其次是间谍地位大为提高。自北宋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并登上大雅之堂，将宋初“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也大大提倡用间。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辙和大学者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写专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并实行“厚赏以精间谍”的政策。连正史《宋史》、《金史》也为姜绶、张顺立等间谍专门单独立传，可谓重视之至。

再次是间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诸如“密码”（字验）、空飘（纸鸢）、窃听（箭囊听枕）、密藏（蜡丸）、信号（鸽子）、秘语（以物名谐音）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是间谍理论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曾公亮的《武经总经》；许洞的《虎铃经》；华岳的《翠微北征录》；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陈规的《守城录》；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的《孙子兵法》注本和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并序》等，对用间与反间都有精辟独到的见地，与唐代《李靖兵法》共同形成了自《孙子兵法》以来的一个群体用间理论体系。宋太祖赵匡胤成立“皇城司”（也称为“皇城探事司”），成为继唐代“察事厅子”和“进奏院”后又一个高层政治间谍机构。皇城司不但对内，而且还对外从事间谍活动。它常常派间谍以外交人员的合法身份，跟随外交使团出访，以便随时进行监控。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现代外交间谍之先声，它与后代的大使、武官等公开合法的情报人员几无区别。

（三）间谍鼎盛期

自公元1206年中国北方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蒙军与金军、夏军、宋军以及中亚、欧洲诸军的战争性质，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战争规模之大，距离之远，时间之长，用间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成吉思汗征金前，充分利用往来蒙、金的使节、商人、官吏以及金国叛逃者，广泛搜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情报。特别是招降金国使者耶律阿海和派遣间谍札八儿出使金国行间，获得了大量金国绝密情报。他在攻宋时，又得力于投降蒙军的宋军将领，从而“察军（宋军）情伪，专务乘乱”，被后世称为“不愧为善于用间之佼佼者”。为了征西，成吉思汗派出大批间谍以商人身份出没于中亚。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所派的间谍随花剌子模国商队前往讹打刺国时，被全部捕杀，成吉思汗随即远征中亚。如果没有充分的中亚诸地情报，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几无可能。

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命速不台会合拔都，率十万大军进攻欧洲。速不台和拔都派出大量商人间谍搜集到了有关欧洲一些国家宫廷及部落的内部情况，各地城市的防御；各派宗教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进军道路及放牧草地等情报，对其军事行动具有重大价值。蒙军到达里海北岸时，奇卜察真人与匈牙利人组成联军抵抗，速不台派出间谍



潜入匈军进行离间,奇卜察真人竟反被匈牙利人所驱杀。速不台攻陷俄罗斯基辅城后,在进军喀尔巴阡山北麓加里西亚平原时,曾将间谍搜集的情报进行整理研判,并制成一幅“敌情判断要图”。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间谍与反间谍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三个领域之中。元军在袭捕南宋名相文天祥、策反南宋将领洪都统、诱击红巾军等军事事件中,都是由间谍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情报后才获得成功。忽必烈曾十分慎重地说过:“宋善用间。”所以对反间谍活动也极为重视。元军先后破获多起宋军间谍案,最多时一次竟捕获上百名之多。对宋军用离间手段企图除掉有关元军猛将的间谍活动,忽必烈也一一予以明察反击,没有上当。

在政治斗争中,元代的权臣在“伺帝起居”、“间谍两宫”的高层间谍活动中十分活跃。为了侦控汉人,元廷实行了社制,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监视。

由于元代统治区域广阔,中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大量亚洲、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不乏从事间谍活动者。元廷曾先后破获了日本、安南等国从事的几起间谍大案。同时为了征战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及中亚、欧洲诸地,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许多情报搜集活动。这些新现象标志着中国间谍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一个新阶段:即中外外交间谍与反间谍战时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个新高峰,尤其在政治监控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王朝历代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对臣属的控制极严,常常亲自秘遣间谍随时随地进行各类侦察。于是臣属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招募收买宫内间谍对皇帝进行反窃听和反窥探。当时便有人对明世宗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之左右,皆嵩(指严嵩)之间谍。”从而造成明代宫廷内部多次祸乱。

自从朱元璋建立间谍特务组织锦衣卫后,又相继组建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使中国古代间谍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黑暗恐怖统治时期。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太监为头子的特务活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灾害,史称“厂卫之祸”。这一黑暗的政治现象上继唐代察事厅子、宋代皇城司之后,下启清代密探活动的密札制度之先。

在军事斗争中,间谍手段也不断翻新,高招迭出,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巧妙运用乡间和反间。如朱元璋以看门老头行间陈友谅;王守仁妙计迷惑朱宸濠;孔镛智擒霸匪阿溪;沈希仪遣赵臣诱惑岑璋等。二是大量使用商人为间。如熊景“阴遣人衣商人服”镇瑶人;沈希仪“阴求得素于瑶人商贩”探情报等。三是农民起义军的用间水平大为提高。朱元璋曾多次告诫部将,农民起义军“尚间谍”。李自成在破洛阳、陷开封、克北京之战中,都非常娴熟地使用大量间谍,对明廷及其军队的虚实了如指掌。张献忠一手导演的“假内江王”间谍案,更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中的杰作。张自成也与朱元璋多次进行用间与反间的激烈较量。

在中外关系方面,由于出现了日本倭寇沿海侵扰的新情况,明王朝十分重视反间谍活动。像胡宗宪诱捕倭间;王忬捣毁倭寇间谍网;戚继光开武学馆训练间谍反倭寇等,都有力地打击了倭寇猖獗的间谍活动。此外,还破获多起安南、葡萄牙、法国、英国和沙俄等国的间谍要案。由于明代不具备元代影响周边国家地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对于反间谍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强烈的安全防范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

明代的间谍理论也有长足进展。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

类》；无名氏《草庐经略》；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何良臣《陈纪》；何守法《投笔肤谈》；揭暄《兵经百字》；吕坤《救命书》；尹宾商《兵蠹》等兵书，均列有间谍专论。从而形成了古代间谍理论继春秋战国、唐宋以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当历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代阶段——清代时，间谍活动也反映出了其独有的特点，即对内严加侦控而对外疏于防范。

清王朝虽然废掉了明代的厂卫制度，但对其臣民的侦控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行密探（也叫逻察）和密札制度。皇帝直接派出密探或密令各地“各派眼目访缉”，以对臣民“严加伺察”，并大力鼓励以密札形式进行告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一时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康熙还派间谍以“织造官员”身份为掩护，前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在当地建立秘密谍报站。

清太宗皇太极于明清之际，用间诱降了明军尚可喜、洪承畴等大将，特别是采用高超反间计谋，借明崇祯之手杀掉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使明王朝“自坏长城”，走向灭亡。康熙在平叛噶尔丹之乱时，以“神探”淖克浑为间，掌握了叛军详情，一举获得光显寺大捷。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清军往往以间谍为“开路先导”，在间杀朱一贵、吴八月等起义军将领时，都是动用了内间策应的方法。尤其在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间谍战。陈玉成以陈文效诱间清军，大败“妖九”李续宾；杨秀清捕杀近千名天京城里的清军内间。清军更是无处不用间。天京城内爆发了由清军策划的“张继庚间谍事件”，使太平天国蒙受巨大损失。曾国藩也密令组建“情报采编所”和编纂《贼情汇纂》，以对付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年间，朱逢甲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间书》。它以《孙子兵法》和《李靖兵法》为理论依据，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的间谍活动，成为对古代间谍理论进行总结的集大成者，在古代间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王朝对国内的间谍侦察活动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但对于来自国外的间谍活动则掉以轻心，疏于防范。

康熙年间，沙俄多次派间谍以“使者”身份前往中国，以仔细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测量北京城墙数据”、“探知中华帝国军事实力和物资资源”。雍正年间，叶卡捷琳娜一世以祝贺雍正登基为名，派间谍沿途“竭力搜集中国边境情报并绘制地图”。沙俄还以“科学队”、“探险队”和“东正教布道团”为幌子，频繁出没中国边疆刺探情报，盗窃或绘制中国地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掌握了中国海防详细情报的沙俄间谍竟然充当英法联军的向导，致使北京门户大沽口炮台陷落。

此外，像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间谍船”；设在中印边境的“蒙哥马利间谍训练营”及派往西藏的“朝圣者”；法国的“耶稣会”驻京公使馆；日本的“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都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猖獗的间谍活动，为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做了大量充分的战前准备。

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对此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然在一些有识之士“警惕内勾外引”的大声疾呼下，也进行了像广西捕获缅甸间谍、允许杨光生发表《不得已》和《辟邪论》、支持林则徐“禁鸦片，除内奸”等反间谍活动，但都由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而对间谍情报活动不予重视，以致根本无法继续展开，甚至遭到干扰和压制。

清王朝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腐朽本质，终于导致了帝国列强大规模的入侵。清代统治者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于宣统年间，仓促组建了军谘处第二厅，以负责对外反

间谍活动。然而此时已为时过晚，回天无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军谘处第二厅成立仅半年后，便走到了尽头，彻底地覆灭了。五千年中国古代间谍史也因此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二、间谍机构

(一) 战国养士

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朝，就已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专职人员，一般以“家臣”担任。《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夏后之臣曰孟涂。”《左传·哀公元年》也说：“使女艾谍浇。”杜预注：“女艾，少康之臣，谍候也。”

商纣王曾秘遣崇侯虎专门对周文王进行监控，随时报告周文王的一言一行。在商朝，巫史掌握着国家政权、军事、教育、历法、司法、记事、档案保管和占卜、祭祀等大权，尤其是其中的司法跟情报活动与间谍机构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故后代有“大理”、“道人”等监察之专职官。

周武王灭纣王建西周后，设置了主管内外情报的职官。他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对纣王之子武庚进行长期监控，史称“三监”。在外事方面，设掌管天子与诸侯之间朝觐、聘问、监视等事务的官职为“大行人”；受王命出使侦察的官职为“行人”（也称“行理”、“行李”）；在边境名义上接待外国人，暗里盘查的官职为“候人”；掌管关隘往来之人的官职为“关尹”；负责语言翻译的官职为“舌人”。周厉王就效仿“三监”，“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首开大范围白色恐怖统治之先河。

春秋时，夏朝家臣（即后世之“士”）从事间谍活动的遗风犹存，并且愈演愈烈，至战国达到顶峰。《左传·文公十七年》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预注：“执讯，通讯问之官。”此外，当时文献中出现了较为详细记载的间谍机构和职官。《周礼·秋官·土师》记载道：“土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沟，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邦令，五曰侨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第一项与第三项与间谍活动直接相关。

“邦沟”之“沟”，汉代郑玄注为“斟酌”之义，“邦沟”即郑玄所注“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秘事，斟酌私知，故举为况也。”

“邦谍”，郑玄注：“为异国反间。”陆德明解释为：“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用兵之策，勿善于此。故《孙子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金宝于人者，非民之将。故三军之事，莫密于反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圣贤将能用间以成，此兵之要者也。”

“邦沟”其实是“行间”；“邦谍”其实是“反间”，可见当时间谍活动的分工已臻细密。不过由于《周礼》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所以有人认为对“土师”职务的记述，可能是后人所托。但是，即使《周礼》中有后人所增所托的内容，但从“沟”、“谍”在其中的语言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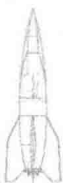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运用了西周的古义,当为原文原义。

齐国曾设有“里尉”一职,专门负责监视平民的出入言行,其主要职责是侦探“匹夫有不善”和“奸人”,然后上报,并“可得而诛”。晋国则在军中设有“候正”或“候奄”的官职。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为:“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左传大事年表》卷十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这些均与西周的“候人”义近。“候”,《广雅·释诂》说:“覩也。《吕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后代的“候人”、“候吏”、“候兵”、“候官”、“候调”等,都是与间谍侦探有关的官职。秦国设有相当国君秘书性质的官职“御史”,往往掌管情报工作。《史记·滑稽列传》说:“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杨宽《战国史》认为他们是“国君的耳目”。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前注多认为“门者”为“看守城门之人”,“舍人”为“宫中近侍”,不确。其实,“门人”(也叫“门下”、“门子”)均为主要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者。《史记,信陵君列传》:“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孙子说“令吾间必索知”“门者”、“舍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就是为了与其进行间谍或反间谍战。这些间谍职官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譬如三国时曹操的“霸府”,就设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四十二人,舍人若干人。其中舍人负责通讯、情报工作。东吴则设有“中书通事舍人”,负责秘密侦探。

战国时记载间谍专职的主要文献是《六韬》。《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说:“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其中“伏旗鼓”主要是制造假情报;“耳目”主要是侦察敌方情报和监控己方军队;“羽翼”主要是从事以假象迷惑敌人和宣传战;“游士”主要是刺探敌方内情;“术士”主要是以迷信鬼神对敌进行心理战。由此可知:《六韬》反映的战国时期的间谍机构已趋于成熟,但仅限于军事领域。由于“王翼第十八”说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是姜太公吕尚对周文王的建议,所以我们不知战国时是否已有这样的实际编制机构。不过从整篇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合理的人员编制和明确的职责任务等内容来看,不可能是空泛之谈,当有所本。

战国又盛行养士之风。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养士达几千人之多。这些士,往往身怀绝技,学属多门。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行办事务,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的作用是“出奇策异智而转危为安,易亡为存”。可视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囊团”。但是在这一“智囊团”中,又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谍报人员之多,活动之广,成效之大,亦为后世所罕见。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私人间谍集团”。纵观战国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这些“士”在扮演主要角色。“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养有几千士之多,其中有许多分布在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对邻国朝廷大事无所不晓。在信陵君救赵国盗虎符的间谍活动中,他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候嬴、朱亥、如姬三名间谍,成功地盗取了虎符,解了赵国之围。这种典型的间谍集团虽说不是国立的,但是已具有间谍机构的雏形。其特点是:间谍只向其主子一人负责,他人全然不知其中内情;主子根据间谍的特长,分派相应的间谍任务;间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严格的间谍纪律,触犯者难逃其惩罚;间谍对主



子也多抱“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一旦暴露，往往以自杀报效。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秦代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其国家体制、机构却较战国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在间谍机构专职人员的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统一了六国，所以秦国以往对外的间谍活动，转移到对国内有关方面的侦探，主要是针对军队和六国旧民。

为了防止兵变，秦中央政府临时设置了监军和护军（也称护军都尉），下有候、骑长等主管情报的军官。常常凭“口籍”（口令）和“铁符”（通行凭证）来盘查往来之人，从中索捕间谍。为了缉捕往来间谍奸人，又设置了“求盗”一职，名义上是掌捕盗贼，但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反间谍。秦始皇派出大批耳目，监视六国旧民，以防旧贵族暗中串通，策划谋反。有时甚至为了缉捕一个间谍，不惜滥杀一大批无辜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总考》说：“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知；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奸也。”

西汉时的“中期”或“内朝”，是主管间谍活动的国家机构。中朝官议事，往往是极其秘密的。譬如《汉书》记载：张安世以东骑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孔光以光禄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可见其保密纪律极其严格。此外，“督之捕盗贼，禁察逾侈”的“直指绣衣使者”和军中的“候官”、“候长”，也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官员。

三国时，除了曹操在以幕僚人员为主的“霸府”内首设负责谍报、通讯的“舍人”外，还设有秘密间谍“校事”这一职官。其职掌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后蜀国和吴国也相继设立校事。至曹丕为帝时，校事权任益重，上察宫庙，下慑众官。其中校事卢洪、赵达等人，常以爱憎行事，擅作威福。校事刘慈更是行踪诡秘，四处窥探，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但其中有不少枉屈之人。后来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极言校事之弊，于是遂罢校事官。在东吴，校事也叫“中书”。孙权时有吕壹和秦博担任此职，二人精于行间暗探之术，被后人称为“用法（指行间的能力）深刻”。他们“举罪纠奸，纤介必闻”，成为孙权的“千里目”和“顺风耳”。孙皓时的校事张立，诡计多端，手法奇特，“吏民皆以之为害”，以致人人自危，惟恐被校事跟踪告密。后来在一片责难声中，“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

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七·校事》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御史台》中说，当时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后，实际上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耳目之司，监控臣下的一言一行，权力极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并主张“风闻奏事”，实际是鼓励告密，因此也名之为“风闻访知”。但这是公开的监控机关。秘密侦探的设置就是校事。魏国利用这两大监控机关，有力地维护了皇权和监察群臣公民。

目前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间谍机构始于唐代的“察事厅子”，但从三国的校官设置来看，已具间谍机构成熟、完善的组织编制、人员配备、领属关系和专门任务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间谍机构当始于三国。譬如当时吴国的中书机构即为皇帝的机要秘书

处,设中书令、中书仆射为其长官,掌州郡文书,奉命作诏并领校事(秘密间谍)。其下有丞、侍郎、宜诏郎、中书通事舍人(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等。唐肃宗时,设立“察事厅子”的李辅国,也是中书令,掌管情报工作。可见三国吴国的中书令、校事和中书通事舍人等的间谍职责及官职名称,一直至唐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吴国在朝中还设立“察战”的间谍官职,《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道:“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今扬都有察战巷。”从中可窥探出当时的间谍“察战”有其固定的组织地点,所以后人称那里为“察战巷”。《三国志》还记载:“(孙)皓大怒,遣察战赏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吴国在边境也设有反间谍组织,称之为“刺奸屯”,“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屯长)一人”。负责边境的反间谍和报警等任务。

南北朝时,为了监控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设置了“典签”一职,常由皇帝派亲信担任此职,充当皇帝的耳目。“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任职”,其“威权甚重,号为签师”。譬如刘宋时,宋文帝听信典签密报,杀掉了功臣檀道济。宋文帝还大量任命亲信为典签、中书令、中书舍人、尚书令等,负责担任间谍情报工作,以至于造成“诸王不王,臣不臣,典签为上”的不正常局面。史书曾记载:“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要之。”他们使诸王、刺史“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伸,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莫由己”。典签把监控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诸王、刺史等上层官吏,甚至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从而激起诸王和刺史对皇帝与典签的怨恨。当时的豫州刺史萧晃,就曾一怒之下,杀掉时时窥探其言行的典签;荆州刺史萧子响,不仅杀了典签,还起兵造反。梁以后,典签渐废。

(四) 隋、唐间谍机构

隋时,隋文帝对臣下官吏的侦探日益加强,其监控组织也日趋严密。不仅有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公开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而且皇帝还设置了许多秘密的耳目。隋文帝经常派心腹亲信侦察内外百官,甚至秘密派间谍假意给贪官污吏或政治对手送贿赂,一旦官吏接受贿赂,便立即处死。在军事上,隋朝设立了左右武侯,除负责皇帝警卫外,还负责“执捕奸非”的反间谍工作和侦察皇帝途经地点的官府内情。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其严密的间谍活动,对唐朝有着很大的影响。

唐初时,武则天为了镇压唐宗室旧臣的反抗,就效法隋文帝,广布间谍密探,时时暗中侦察打听这些人的踪迹,并鼓励告密,使唐宗室诸王及旧臣惶惶不可终日。唐肃宗时,太監李辅国权倾朝野,为了镇压对其不满的文臣武将,秘密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以侦探臣僚。这些间谍称之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听儿”,专门从事秘密侦探活动。只要有谁敢背后讥讽李辅国的,立即会被侦知而拘捕拷打,即使是权力很大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也不敢过问。李岷为相时,他实在无法忍受李辅国秘密特务的横行霸道,便冒死上朝叩头状告李辅国专权乱国,唐肃宗这才剥夺了李辅国的权力,“察事等并停”。唐末时,李辅国设置的“察事厅子”还有其余波。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广陵,曾厚资雇用了一百多人为密探,专以刺探官吏百姓的秘情隐私,人称“察子”。唐代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也记载道:“得百余人,厚其官慵,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唐朝御史台的察院也充当皇帝的耳目,负责暗中侦探情报工作。“安史之乱”后,又设置了“非常官”——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对军队进行有效监